

第 一 章

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 革命时期的诸城状况

(1921.7—1927.7)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将其魔爪伸向诸城，进行疯狂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经济掠夺，诸城人民处于双层压迫之下和水深火热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对诸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城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益强烈。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诸城籍人王尽美、王翔千等 20 多人先后在外地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诸城籍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影响，诸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为后来中共诸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诸城政治经济形势

诸城地处内地连接东部沿海口岸之交通孔道，东南濒临黄海，北靠胶济铁路，东与青岛毗邻，西部连接泰沂，时总面积 4071.5 平方公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把山东半岛作为向内地入侵的跳板，诸城则为必经之路，首当其冲，成为较早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之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诸城人民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帝国主义对诸城的侵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通过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并深入到广大内陆地区。1887 年，德国神甫到诸城传教，并在建华镇设立天主教堂，于程戈庄、西老庄、大岳戈庄、于家庄、格德乔、郝家村、姜戈庄、黑土乔、琅琊埠、王家岭、王家朱庙、岳沟、十里堡、芦河、大宋、店子、刘顺村、马戈庄、孟家屯、小李家

庄、袋村、苏家庄、朱苏铺、枳房、都吉台、潘家庄、河汙、祝家灌津、赵戈庄等地设立支堂 29 处，发展教徒 500 余人。1890 年，瑞典国牧师狄德奎来诸城传教，兴办瑞华基督教浸信会，后瑞典牧师令波尔约翰夫妇到诸城，于 1905 年在县城北关兴建基督教教堂，同时在农村设立福音堂 15 处，进行传教。1902 年，德国牧师和士谦、传道员黄务真来诸城，在城东关赁房作礼拜堂，兴办鲁东信义会。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纷纷在诸城建教堂，办教会，发展会员，建立起一整套宗教机构和网络，并通过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孤儿院等所谓传教机构，披着慈善的外衣，贩卖精神鸦片，对诸城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他们一方面向人们灌输“安分守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求得死后上天堂”等奴化思想进行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则与官府勾结，操纵地方政权，包揽民事诉讼，并为本国提供情报。民国元年诸城宣告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德国神甫顾思德与清知县吴勋秘密策划，电请沂州巡防营出兵数百人，攻破县城，残杀起义民军 300 多人，城内财物被洗劫一空，轰轰烈烈的辛亥独立运动惨遭失败。此后，宗教势力越来越猖獗，他们强行置买土地，常年收租剥削；他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中国封建官府的法律保护，攫取了许多特权；他们勾结官绅，把持非类，勒索百姓，残害进步力量，在诸城大地上为所欲为，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欺骗性和广泛影响的侵略工具。

1898 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并攫取了修筑和控制胶济铁路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使山东进一步殖民地化。诸城地处胶济铁路南侧，临近胶州湾和青岛市，境内物产丰富，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其次为手工业和商业，既具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又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方便之地。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诸城的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和手工业制品被源源不断地掠走，而大量的资本主义工业品涌入诸城境内，一时洋布、洋线、洋袜、洋油、洋烟等洋货遍布城乡，充斥市场，严重地遏制了诸城经济的发展，使原本弱小的手工业经不起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冲击，纷纷破产和停业，满目疮痍，凋蔽不堪。1904 年，德国人雇用民工在境内黄牛山一带实施手工开采云母矿藏，掘矿井 3 处，历时 3 年，共掠夺开采原料云母 300 余吨。1916 年，日本人小林英一，沿德国人所掘矿迹，重行开采，并设事务所专门管理云母采掘与外运，历时 1 年，采掘云母 120 吨。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诸城脆弱的经济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

诸城是历史上有名的封建堡垒，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势力强大。臧、王、刘、李、丁五大地主家族垄断了

诸城经济，“一户千顷地，万家无寸土”。臧氏家族拥有 26.4 万亩土地，遍布邻近 6 个县；王氏家族拥有 12.27 万亩土地，全县无处不有王氏的地。全县占总人口 2.6% 的地主占有 70% 的土地，而占总人口 95.8% 的穷苦农民只占有 22.3% 的土地，只能赖租佃以为生计，长期处于被剥削地位。地主盘剥佃农的租佃方式多种多样，但不论哪种方式，凡租地者每亩最少交租 40%，最高 70%，遇上灾年欠收，亦不能减免分毫。除交租外，地主还通过“见厘成分”（租额尾数有厘者进为分，加 1 分多收 1 分地租）、“空地交租”（将租地中不能耕种的沟、阡、路等计租）、“落地粮”（交租时刮斗落地之粮不许佃农收回）等方式盘剥农民。有些地主还要佃农交纳看坡粮、乞丐粮、老鼠粮、鸡食粮、褶子粮、节礼粮等以及苦子、炊帚、扫帚、锅盖顶、蒲团、艾子绳、蒸饽饽草等 30 多种额外物品。交租时，地主还以大斗大秤苛尅农民，佃农 1 斗粮，只能抵 7 升，租草 2 斤，只能抵半，被佃农斥之为“对和秤”，故境内有民谣说：“地主的斗，老虎的口，七平八尖九外流”。广大穷苦农民在地租的重压之下，还要受地主“乾拨工”的劳役剥削，一些大户地主常要邻近佃户男女去当差，不付报酬，男差打更、护院、抬轿、接送闺女、送葬、清扫街院、捉蚂蚱喂鸟等，女差洗衣、做饭、奶娃娃、梳头、做针线等。农民靠租种土地，辛劳一年，所剩无几，仍旧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遇天灾人祸，生活更难维持，有的到外地讨荒，有的被迫下关东，有的卖儿卖

女，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其间，清政府为了赔偿巨额外债，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地方贪官污吏则借机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初现一线生机，但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中国随之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反动军阀为扩充势力，经常抓丁要钱，横征暴敛。当地地主、土匪则沆瀣一气，依仗军阀势力，兼并土地，打家劫舍，欺压百姓，使本来极度穷困的诸城人民陷入更深的灾害之中。

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步遭到破坏，客观上则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主豪绅开始兼营起工商业，向新兴企业投资。其时，诸城的地主大户亦纷纷到青岛、济南、天津等城市，经营房地产，插足工商业买卖。境内重要城镇如县城、枳沟、相州、泊里、潮河、柴沟等，地主官宦之家也开设了许多酒房、油房、茶庄、布店、粮栈、药房、土陶、木器、服装等店铺作坊。地主兼营资本家，剥削花样增多，他们控制、垄断市场物价，加速了农民手工业的破产，不少手工业者被迫只身到外地出卖劳动力。由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剥削，逐步扩大了诸城新式无产者的队伍。

三、文化教育发生了变化

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封建大门，使中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变化。腐

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得不在统治方式上做一些改革，实行所谓“新政”，开始提倡兴办新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饬令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学，命各省、府、州、县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诸城是封建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地主官绅出身的上层文人比较多，对诸城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年，在县城观海书院建成县立高等小学堂 1 处。次年，相州办起私立三等小学堂 1 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建立初等小学堂 2 处，官立半日学堂 1 处。宣统元年（1909），建县立初等农林学堂 1 处；同盟会为了培养骨干，宣传革命，建立东武公学 1 处。辛亥革命前夕，共举办各种学堂 32 处，其中，官立学堂 5 处，公立学堂 13 处，私立学堂 13 处，教会学堂 1 处。中华民国立国后，积极推行新学，县劝学所派人到各地查封改良旧式私塾，开办新式学校。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诸城的文化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1920 年，全县高等小学、女子国民小学、城乡国民小学等私立、村立、区立、县立新式小学发展到 197 处。教学内容中、西学并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德观念方面仍遵循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同时也传授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识。新学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从而开发了民智，培养了一批新型文化人，使之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发挥了各

自不同的作用。

第二节 诸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维护正义、嫉恶如仇的诸城人民，向来不甘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不忍外来侵略者的欺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1899年，诸城西乡臧家庄子一带农民数百人，手持棍棒、大刀集结县城，威逼县衙均富分粮，救济贫民。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富士楼组织革命同盟会，诸城人民积极响应，纷纷加入同盟会。1906年，诸城的同盟会员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积极开展活动，以王心葵、臧少枚为首，创办东武公学，发动学生全部加入同盟会。1908年秋，同盟会员刘冠三介绍昌城镇隋家官庄隋理堂、泊里镇北吴家村吴大洲等人加入同盟会，隋理堂加入同盟会后，动员族中侄子10余人加入同盟会。至辛亥革命前夕，诸城先后有300多人加入同盟会。他们秘密开展活动，宣传三民主义，并与开明绅士臧汉臣联系，购买枪支，计划以诸城为革命根据地举行起义。1912年2月2日，诸城人民配合民军一举攻克县城，赶跑清知县，宣布

城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

1915年春，柴沟小刀会首领曹志成率领农民在五龙庙起义，打富济贫，坚持斗争 20 余年。1916年5月17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马海龙支队为讨袁护国，率兵入境，在诸城人民的配合下，攻克县城，开监放人，开仓济民，宣告独立。是年，郑耀臣组织民众在白龙山竖起农民起义大旗，反袁护国，反对封建压迫，保护穷苦百姓，打地主，斗恶霸，将大地主的财产分给百姓，境内东北部的佃户一连二三年没有向地主交租。五四运动爆发后，诸城人民掀起了反帝救国运动高潮。1919年6月5日，学界在县城召开国民大会，演讲“提倡国货，保全领土”，县立高等小学学生王伯年啮指血书“宁死不当亡国奴”。是年暑假，王尽美、王翔千等旅济学生回到诸城，组织反日会、学生会，宣传反帝爱国和新文化运动，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唤起民众，掀起革命热潮。1925年6月，共产党人张少卿、李宇超、孟超等从上海回到诸城，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声援会，积极开展反帝斗争，查禁日货、英货，组织声讨大会。同年3月，以伍座周、管介三、管德山为首，聚集农民 100 多人，在诸城东南部之鲁山举行起义。起义农民首先抢了琅古尧大地主丁士三的粮食，并提出“剿匪除霸，安民保家，打倒土豪，废租减息”的口号。此后又逼迫地主写了废除租息的保证书。起义队伍迅速发展数百人。诸城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进行的无数次英勇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表现了人民群众顽强的反抗精神。但这一切单凭本身的自发斗争，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旋生旋灭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王朝，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不能充当使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导阶级。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必须由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这就是能够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并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同强大敌人进行不屈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

第三节 五四运动对诸城的影响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政权，复辟帝制，建立起大地主阶级官僚军阀的专制统治，镇压革命力量，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使中国人民从失败中受到教育，从而激励人民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进行新的探索和斗争。从 1915 年起，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以陈独秀为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导向，先进的知识分子打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以磅礴的气势向封建主义传统思想冲击，唤醒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

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狰狞面目的彻底暴露，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点燃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烈火。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集会并游行示威，强烈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京学生点燃的爱国火焰，迅速燃遍全国。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这个运动，纷纷举行政治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高潮。

五四运动的洪涛很快波及到诸城，并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积怨，对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仇恨，顿时化作满腔怒火迸发出来，在外地回乡学生的鼓动下，城里学生率先行动，继而枳沟、相州、昌城等村镇紧步其后，学生纷纷罢课、集会、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愤怒的呼声响彻城乡。5月下旬，县城各学校学生联合商会、名流士绅等，在观海小学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京、津、沪、济回乡学生和县城学界、商界代表百余

人，绅士数十人。会议经过酝酿讨论，决定组成以学生为主的各界后援会，选举臧扶九、臧亦蘧为正副会长，下设评议部、干事部。后援会成立后，即派出许多宣传小组分赴四乡串联发动，进行宣传。6月5日，学界在县城西河滩召开国民大会，演讲“提倡国货，保全领土”，城乡数千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回乡学生代表邱纪明、徐子奇首先介绍了北京、济南等地学生运动的情况，爱国学生争相登台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滔天罪行，介绍印度、波兰、朝鲜等国家的人民当亡国奴的惨痛教训，声泪俱下，不能自己，情景十分悲壮。县立高等小学学生王伯年讲到激奋处，撕下衣襟，啣指血书“宁死不当亡国奴”七个大字，使会场气氛空前高涨，群众情绪达到沸点。会后以王伯年的血书条幅为前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各界人士，县城大小商号店铺纷纷关门停业，形同“罢市”，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到学生游行队伍，壮大了声势。参加大会的老同盟会员、诗人孟超写诗赞道：“望断桑榆泪眼枯，血书七字胜兵符。中华自有真男子，宁死不当亡国奴！”

在相州，进步知识分子王翔千，亲自组织各学校师生在东大庙前搭起高台一座，举行千人集会，并游行示威。学生沿街宣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昌城，老同盟会员、诸城辛亥、丙辰独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隋理堂，和观海小学学生徐宝梯（陶钝），鼓动一批教师、学生、农民和开明士绅在刘家

河岔召开反日大会，隋理堂之女、县立丙等女子学校教师隋焕东，带头登台演讲，慷慨激昂，群众深受感动。在枳沟，由学生会和商会联合成立“枳沟各界救国联合会”，印发宣言传单，宣传对日经济绝交，限期禁绝日货。学生组织“十人团”，分头到集市、村庄进行宣传，到通往青岛的大路上盘查日货。

五四运动爆发后，诸城在外地的许多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回到家乡参加活动，积极开展反帝爱国和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北京求学的邱纪明偕同两位同学首先回到诸城，到各个高小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广大师生积极投身运动。王翔千从济南回到家乡相州，以学校为基地，召集师生座谈会，分析国内外形势，介绍城市各界运动开展情况，动员教师王子容、学生王姓林等一批骨干，带领广大师生利用集会、游行、演讲、说唱等形式，在本地或到附近集市村庄进行宣传，并发起成立国货维持会，大力宣传抵制日货，禁止土特产品外运。同时兴办女学 1 处，并积极指导各校学生学习白话文，阅读进步书刊，使相州一带成为五四时期全县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是年暑假，济南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作为济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回到家乡诸城开展运动，他首先肯定了诸城的运动形势是好的，赞扬了诸城人民的爱国热忱，并恳切地勉励社会各界人士“把运动坚持下去，确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先后到县城各学校宣传发动，并组织成立学生会、反日会，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唤起民众，掀起革

命热潮。随后回到枳沟，传播五四运动的火种，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利用《长江歌》的曲调填写新词，在家乡北杏及周围村庄群众中教唱。歌词大意是：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得到了深入蓬勃的发展，各种进步书刊、新诗话剧等纷纷出现，《新青年》、《新生活》、《中国建设》等进步书刊在诸城广泛流传。白话文以其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与文言文的较量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礼教、封建迷信遭到猛烈冲击，庙堂、神像失去了昔日的尊严，有的则被推倒砸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风尚不断得到发扬。

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学生充当了运动的先锋。他们在城乡广泛活动，搞宣传，查日货，昼夜奔忙，表现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在运动中，他们自身也受到了锻炼，不少人经过五四革命风暴的战斗洗礼，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而后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成为无

产阶级先锋战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四节 诸城籍早期共产党员的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诸城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直接投入斗争洪流并使运动取得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从此，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秋，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诸城大北杏村人）、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开始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革命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山东党组织的创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济南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王象午（中曹村人）、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志坚（相州人）亦为“励新学会”发起人，并积极为《励新》半月刊撰文。其他诸城籍人如王意坚（相州人）、王铎林（相州人）、赵震寰（相州人）等亦先后加入这一进步组织。1921年春，王